

不談毛澤東的中共革命史 如何可能？

——評李金錚《重訪革命：中共「新革命史」的轉向，1921-1949》

● 毛 升



李金錚：《重訪革命：中共「新革命史」的轉向，1921-1949》（香港：開明書店，2021）。

在現代史研究領域，「新革命史」這一提法已逐漸為學界接受，甚至成為某種時髦。近年來中青年

學者所發表的相關論文，即使刊登在以「黨史研究」命名的期刊上，也多刻意貼上「新革命史」的標籤，意在與之前的研究相區隔。這一領域近年也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，並引起了國外學者的注意^①。「新革命史」的首倡者是南開大學歷史學院院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李金錚，長期研究近現代經濟社會史、鄉村史，1990年後轉向中共革命史研究。這種轉向應受到其在南開大學讀博士期間的導師魏宏運教授影響。

魏宏運以研究革命史著稱，較早將西方學術界治中國革命史的方法引入中國，開風氣之先。他於1984和1991年組織了兩屆研究抗日根據地的國際學術會議，邀請了周錫瑞 (Joseph W. Esherick)、塞爾登 (Mark Selden)、弗里德曼 (Edward Friedman)、范力沛 (Lyman P. Van Slyke)、戴瑞福 (Ralph Thaxton) 等西方研究中共的重要學者參加，並出版會議論文集^②。

「新革命史」的首倡者李金錚在《重訪革命》一書收錄十五篇論文，前三篇討論「新革命史」的理念與方法，其餘十二篇則是具體的個案研究。對於有興趣了解何謂「新革命史」、該如何研究「新革命史」的讀者來說，本書無疑是一個重要文本。

* 筆者感謝張志偉、陳鐵健、譚徐鋒、郭寧等師友及匿名評審人的批評指正，對本文的修改極有幫助，特此致謝。

李金錚無疑是在乃師的基礎上，試圖為革命史研究尋找新路，長期為此探索^③。最近，他將2006年後發表的相關代表性論文集集成冊，出版了《重訪革命：中共「新革命史」轉向，1921-1949》（引用只註頁碼）一書。書中收錄的十五篇論文，前三篇討論「新革命史」的理念與方法，其餘十二篇則是具體的個案研究。對於有興趣了解何謂「新革命史」、該如何研究「新革命史」的讀者來說，本書無疑是一個重要文本。

一 邊緣化還是內捲化？

在本書第一篇文章的開篇，李金錚就提出中共革命史與太平天國、義和團運動、辛亥革命等研究類似，「在學界都發生了由熱變冷的趨勢」，並為革命史研究的邊緣化現象憂心。他認為原因有三：一是長期以來的革命範式削弱了革命史的學術性；二是改革開放後「現代化範式」成為主流，學者不再關注革命，將興趣轉向現代化研究；三是著名學者李澤厚、劉再復1995年出版《告別革命：回望二十世紀中國》一書，提出「告別革命論」，削弱了革命研究的重要性（頁2）。本節將分析李金錚所謂中共革命史「由熱變冷」一說的可能由來，並說明該講法未必符合事實。

如果當年革命史曾經「熱」過，那是怎樣的一種革命史？那只是學者在執行政治任務，目的不為求真，而是服務現實政治。學者沒有選擇研究領域的自由，甚至觀點都不能偏離官方的主流論述。這類所

謂的革命史研究，在史料發掘上可能有所貢獻，在觀點創新上則乏善可陳。如果有些與官方論述不同、更符合史實的新觀點能被官方接受，常常並非因為真實戰勝了虛假，而是得到了黨內比較開明的高官支持，否則難逃被批判的厄運。如「富田事變」獲得官方一定程度的平反，固然有學者的貢獻，更因為得到了蕭克將軍的支持^④。而「西路軍問題」之所以得到徹底糾正，更是因為當事人陳雲、李先念位高權重，一言九鼎，指出「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，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」^⑤。因此，即使這是一種所謂的「熱」，也與學術研究關係不大。

改革開放後，社會獲得了一定言論空間，黨史研究者開始逐漸擺脫官方的論調，根據史實重寫黨史，做翻案文章。毛澤東時代的黨史書寫以蘇聯的《聯共（布）黨史簡明教程》為藍本，不僅強調中共革命的正義性，且以此作為黨內路線鬥爭的工具。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後，研究者希望撥亂反正，對中共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有一個符合史實的評價。黎澍、李新、陳鐵健、林蘊暉、戴向青等前輩黨史研究者做了很多開拓性的工作，儘管研究領域還是以政治、軍事為主，但解放了很多學者的思想，示範效應不可低估^⑥。

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，中國學者與西方中國研究學界的互動交流頻繁，現代化範式逐漸成為主流視角。學院派的革命史研究逐漸擺脫了1981年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〉的論調，與中共

李金錚提出中共革命史與太平天國、義和團運動、辛亥革命等研究類似，在學界發生了由熱變冷的趨勢，並為革命史研究的邊緣化現象憂心。如果當年革命史曾經「熱」過，那是怎樣的一種革命史？